

## 译后记

这是我第二次翻译埃及侯赛因·卡米勒·巴哈丁博士的著作。他的上一本书《无身份世界中的爱国主义——全球化的挑战》，是2000年5月他以教育部长身份访华时，与埃及前驻华大使努·贾拉勒博士一起当面委托我翻译的。在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的支持下，于2001年9月出版，2002年秋，陈至立部长访埃，还将中译本作为礼品之一带去，受到他的好评。《十字路口》是巴哈丁博士2003年出版的新著。他寄来5本样书，请埃及驻华大使阿里·侯夫尼和驻沪领事阿卜杜·法塔赫·安泽鼎转交，安泽鼎又于该年4月18日给了我作者委托翻译、转让版权的函件。鉴于巴哈丁博士的身份，我曾专门向教育部国际司请示，于6月5日收到同意回函。

我深感歉疚和不安的是，这本篇幅不大的著作竟拖至今日才付梓，特别是其间阿里·侯夫尼大使、埃及驻沪现任总领事塔希尔·法拉哈特和已回国担任外交部司长的安泽鼎先生都曾多次问及翻译的进展，而且去年9月，埃及内阁改组，巴哈丁博士在担任教育部长14年后也已致仕。拖沓的主要原因，是这两年，正是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倾力推行其中东改革计划的重要时期，我所在的中东研究所，要应对的社会需求——参加各种研讨会，为高校、政府部门、学术团体和企事业单位作报告，以及接受媒体的采访，撰写评、专论，极其频繁，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非但不能置身事外，而且还得努力发挥思想库和咨询服务基地的作用。我拿到书后，虽然及时开译，但不断被各种各样的临时任务打断，实在难以觅得一段时间静下心来细读推敲。不得已，我请了丁俊副研究员参与翻译。只是，他在攻读博士学位，听课和准备论文一环扣一环，也很忙。去年底，他将完成的部分交我。直到今年寒假，我才终于腾出时间，结束了这项已历时2年的译事。

巴哈丁博士是一位具有前瞻性、战略性视野的

埃及学者型高级官员。他的《无身份世界中的爱国主义》一书，至少给我留下了两点深刻的印象。一是他论述了埃及作为一个世界闻名的文明古国，一个在地缘政治和国际社会中都颇有影响的发展中国家，该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挑战，特别是对主权国家的社会、政治、安全、环境和文化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埃及又应怎样认识自己的身份和属性，维护埃及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凝聚力；二是作者针对全球化是一把有利有弊的双刃剑，确定了一个原则：“全球化的需要不是强加给我们的，也不可能让我们丧失文明、文化、根源和身份等最重要的成分，我们不会为了获得物质利益而不由自主地丧失自我”，也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我们别无他法，惟有一起合作，塑造民族的智慧，培养出担负这一使命、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新的几代人”。我的这种印象，不少读过他著作的国内同行也有，如发表在学术批评网上的内蒙古民族大学王泰老师所作的书评《全球化、爱国主义和历史教育》中，就指出：“巴哈丁部长这本不足10万字的小册子可以使我们在较短时间里捕捉到在一个全球化时代中维护民族价值观核心的意义和途径，提示了在强大的全球化浪潮冲击下，如何保持住自己民族的特性从而维护世界的多样性”。

巴哈丁博士的《十字路口》写在举世震惊的“9·11”事件之后，可以说是《无身份世界中的爱国主义》的续篇。他在书中清醒地看到，发达国家在第三次浪潮之后，已取得了惊人的科技进步，具体表现在“科学发明，知识爆炸，依靠因特网和人造卫星的通讯革命，开放的空间时代，以及各个领域的科学家们每天带给我们惊喜的新发明之中”，而“在我们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里，我们未能意识到自己浪费了大量财富，将时间耗费在不是地方，我们丧失了许多机会，忙于毫无意义和裨益的纷争，我们的精力，已被鸡零狗碎的琐事、争斗、分歧、欲望和野心消磨殆尽”，因而“正处在一场

真正的悲剧之中：在我们的能力和抱负、声势和实力之间，在本民族的成就和其他那些掌握了科学要素、为争取进步不断努力奋斗的民族的成就之间，差距已越来越大。我们已濒于一道真正的鸿沟——文明和科学的鸿沟”。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作者也尖锐地指出，“9·11”事件后，发达世界在加强控制、滥施威权，“霸道的强权使真理、正义、法律准则处处碰壁，它颠倒是非，在很多情况下，已不再需要知耻的美德；它的所作所为，事先已得到开脱；它的主张无论怎样反对都会执行；它的打击雷霆万钧，谁都难以承受”，而这，恰恰正是滋生极端主义思想和恐怖主义行为的根源之一。

作者认为，埃及和阿拉伯世界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是屈从现状、甘于沉沦，还是超越挫折、奋发图强，阿拉伯民族应走向何方？他的回答是：改革。因为，“改革作为在这个急速变化的世界里，适应时代变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一种必需，它不仅是我们应该接受的现实，而且应当成为我们处理当前和未来各种问题的纲领”。巴哈丁博士在书中从一位教育家的视角，高屋建瓴地通过反思、吸收先进价值观，分析发达国家成功的要素，阐述了他关于教育立国、教育图强的思想，并提出了一系列的设想和措施。他的许多观点，都与我们相似，他的不少论述和建议，对我们都很有启迪。这本《十字路口》，对我们了解埃及和阿拉伯国家精英人物对当代国际关系、中东问题和发展中国家教育发展等方面的看法，无疑是很有帮助的。

这本著作的翻译出版，一直受到埃方的重视和支持。阿里·侯夫尼大使在百忙之中于去年深秋特地为中译本作序。我尤其难忘的是安泽鼎前总领事对此书的关注。记得他1999年来沪创建埃及总领事馆——也是阿拉伯国家在沪设立的第一家总领事馆——时，就与我谈及了在中埃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之后应如何加强两国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是他，亲自到我校来会见戴炜栋校长，倡议在中东研究所设立“苏珊·穆巴拉克图书馆”，这些年，由于他和侯夫尼大使的关心和安排，埃方已通过各种途径向我所赠书数千册；也是他，向我建议签订图书翻译协议，陆续翻译出版了一些埃及学者、作家有关中国的著作。去年5月底，我赴埃及参加“翻译与文化互动”国际研讨会，与他别后一年重逢，格外

亲切，几乎天天见面：不是他到我下榻的宾馆来看我，出席我作报告的专场，就是邀我到他家，把我介绍给他的母亲和小外甥，让我在外交官俱乐部与当年在北京、上海工作过的大使夫人、外交官们聚餐，共话别后。他在沪工作4年，几乎给每一位与他有过交往的人，都留有美好的印象，因为在他身上，集中反映出了埃及人的优点：热情开朗，善解人意，言而有信，好客大度……他虽身为高级外交官，却一直十分重视文化交流与合作。因此，当他问及《十字路口》的翻译情况时，我真是汗颜之极。好在新的一年开始了，我将有机会再访埃及，但愿能在尼罗河畔见面之时，能将这本书的中译本当面呈上，以聊补我内心的缺憾。（朱威烈）

## 第二节 全球化进程中地理和国家屏障的瓦解

全球化只是一个舞台，在上面活动的是众多的跨国公司，它们的预算超过许多国家的财政，它们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不相一致，它们的追求没有止境。因此，跨国公司高举全球化的旗帜，为自己开辟向市场渗透的途径，排除区域性的立法和竞争，使自己毫无障碍地遍布各地，并且全然不顾对贫困的第三世界国家利益造成的损害。

未来的变化包括那些过去不曾提出讨论的事实和情况，例如，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的界限已变得混淆不清，我们无法为此制定明确的标准或框架。按照关贸总协定和自由贸易协议，屏障的透明性和边界线的可渗透性大大增加，对谁都是有利有弊，因为如果边界可以渗透 (porous)，那么，它就容许信息流通、贸易自由往来和人员自由迁移，而且也会容许那些我们的本性、传统和习俗所不认同的习惯和问题自由转移。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国际性的挑战，因为21世纪是国际化的世纪，所有的民族性都已受到巨大的压力，以至于许多思想家正在讨论民族实体本身的概念。民族实体还能继续应对世界上的集团、跨国公司和前所未有的贸易自由吗？还能继续应对无穷无尽、漫无边际的知识爆炸吗？在面对一个自由贸易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一个国际化市场和一个小小的地球村里，它还能形成一种对民族工业、民族价值观和国民决议的国家保护吗？

同样，任何国家躲在自己的国境线内独享安乐，而听任其他国家去应对饥饿、贫穷、恐怖或落

后的时代已经过去,因为通讯革命的现实已跨越了时空屏障,技术进步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为个人提供了资源、能力和机会。这方面最突出的例证,也许就是我们看到的在那些遭受贫穷、饥饿和恶劣社会状况的国家所出现的集体向发达国家迁徙的现象。移民滞留在发达国家的沿海岸,成为一种负担,这些国家的边防安全机关穷于应付,因为如果抓住一些人遣返,另一些人就会逃之夭夭,而且即使是被他们遣返的人,也还会去而复来。实际上,美国就深深地被大量硬是要生活在其境内的移民问题所困扰。这一问题虽然严重,但还不是唯一的危险,还存在一种更严重、更危险的可能性,即那些感到自己已被边缘化或受到了虐待,处于不公正的现实之中,被当成了二等或三等公民的民族,他们极有可能出于极度失望和失落的心理,做出罕见的绝望反应,去反对其他国家。这种现实的可能性正在超越理论思维而成为事实,也许在世界各地发生的各种分散的事件中,我们正生活在酿成这类绝望反应的土壤之中。

通讯革命蕴含的一个事实是,它已对民族实体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因为伴随着通讯革命,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开始相互联系,他们可以看到、感受到远在数千英里之外的传闻和发生的事件。时空转移对每个人来说都已变得轻而易举。任何国家都不能远离可能发生在万里之外的事件,孤立地生活。因此,对任何民族和任何明智的国家来说,都必须把对国际的关注作为其观察事物的一部分,因为外部事件已非正常学术意义上的外部事件,国际事件也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国际事件。各种外部事件和国际事件都有可能产生本地影响和国内影响,反之亦然。国家考量与国际考量间的协调、平衡,已经成为各地的人们心神不安的问题。同样,先进技术与技术对生活方式、文明文化价值、民族根底的控制之间的平衡,也已成为各国的大难题,如果问题继续朝这一方向发展,那就意味着任何国家都回避不了这一现象而生存。另一方面,如果预期的失业在不远的将来成为国际性问题,那么,按照这种趋势的预测是,职业或就业机会将仅限于知识产业的范围。全球化形势下的理想劳动者,是机器人(robot),第三次浪潮中的基础职业,是符号分析员(symbolic analyst),最典型的活动领域,是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我们在制订地方规划时,必须透过国际视角,依照第三次浪潮和后工业社会的机制和规则进行思考。边界、屏障和堤坝正一个接一个地在倒塌,国际市场不承认边界和屏障,也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各国的能力资源和经验的自由流动,任何人都无力抗拒,经验已成为稀缺的通货,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工作,国家的力量就在于能将这些稀缺的通货从其他国家吸引进来。智力和经验的流失已成为重压在民族实体身上的一个痛苦的事实。

有关未来的话题包含许多重大而新奇的可能性。我们读到了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的《工作的终结》(The End of Work),或者尼尔·波斯特曼(Neil Postman)的《教育的终结》(The End of Education),或者凯尼奇·奥麦(Kenichi Ohmae)的《国家的终结》(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这类著作说明,随着自由经济的发展,非政府机构活动、联合国各种会议的发展,各种国际协定尤其是贸易、关贸总协定的签订,以及个人和小团体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我们所熟悉的国家形式及其边界,正面临着一种真正的解体。全球化体系具有一种离心力,能将人从其根基和土壤中拨起,社会组织便因之松动。全球化不容忍屏障和限制,将横扫一切地理的和国家的界线,甚至道德界线。新体系中的市场也不承认界线,不容忍界线的存在。

在这种新体系中,投资由不止一个国家组成的国际垄断集团进行,这些具有国际性或多国性的垄断集团所受到的约束和限制,都很脆弱。这些集团或组织的本性是,为了攫取他们想要的眼前物质利益,有时不惜跨越一切障碍,只看它们的纯经济利益,其他一切都在所不计。根据自己对优惠条件的需要,可以随时转移到其它条件更优惠的国家。我们可以设想,假如香港不再是最照顾投资者利益的地区,而新加坡将给他们提供更大的优惠,那么,这些机构和资本就会突然甩开前者,转向后者,全然不顾对该地区将造成的空缺或将危及其稳定的动荡。

我们阿拉伯国家迫切需要的是,以未来的前瞻性理性思维去思考未来,而不是用过去的旧思想——它依然支配着许多公职人员的思路,他们患有一种新病症,就是时代盲。我们周围的世界在变化,思维方式在发展,力量的源泉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转

换。许多传统上属于南方阵营和第三世界的社会和国家,已经开始掸拂掉传统思维的尘埃,冲破落后的屏障,逐步向发达国家和当代复兴俱乐部成员国的资格靠拢,它们依靠的是信息和通讯技术革命及其所带来的成功机会和优势。根据信息革命的标准,阿拉伯国家还只是站在门坎上,至今不能有力地进入这一关键性的发展进程。

埃及是世界的一部分,不可能脱离这个世界,因为伴随着通讯革命,时空转移对每个人来说,都已变得简捷易行,任何国家都不能远离事件而独自生存。问题只在于,我们怎样才能协调这种种的考虑?

过去,我们能够恪守地方标准,蜷缩在地理边界之内,满足于地方的运作比率,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并且一去不复返了。在新的世界秩序和全球化格局中的国际竞争,已不再容许某一国或某一社会有机会去执行地方标准,这是我们每天都能感受到,能听到和看到的现实。已经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躲在自己的国界内,或执行自己的特殊标准,而对四面八方向我们大家刮来的这场飓风置若罔闻。我们前不久曾经可以满足于地方标准,可以拿内部的情况作为借口,有能力去利用世界大国的平衡,有时候还可以从这里或那里得到实惠,满足于执行自以为适合自己的标准或制度,满足于落后的技术,得益于人口众多、劳力低廉或凭借自然、地域和历史拥有的其它竞争优势,但是,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任何国家都不能再依照地方标准参与竞争,长立于世界国家之列。那样的国家毫无疑问将会被边缘化,失去自己的生存能力,在此之前,首先是失去许多自己的生存要素,以及独立和意志自由。在我们这个曾把科学和文明授予世界、把知识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的国度里,这样的结局是我们无法面对的。我们伟大的祖先曾经创造了这个地球上最早的文明,实现了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复兴,他们的荣耀依然历历在目,依然令各国乃至今天的发达国家钦佩和叹服。因而,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执行国际标准。

在这一点上,我想起了我们的伟大的作家阿卡德先生<sup>1</sup>的诗句:

祖上伟大光荣,  
自己寻常平庸;  
好把先辈夸耀,  
注定受辱无穷。

全球化正竭尽全力瓦解国家,所有的国家,因为国家的民族体制实体是全球化面对的巨大障碍。没有什么活动比贸易更敌视民族主义的考量,没有什么意识形态比资本主义更不关注爱国主义,也没有什么挑战比市场更能损害国界了。因此,全球化在它瓦解国家的尝试中,打着各种旗号,表面仁慈,实质却令人痛苦。地方分权制、社会参与、非政府组织作用的增强和尊重人权,这些都是不存在分歧的原则,它们为国家行动增加了能量,是透明性和公正性的必要保障,也是应该受到保护的基本权力。但是,一旦分权制变成限制国家在维护统一的国家组织、坚持民族属性和尊严、保障机会均等方面的核心作用的工具,对市民社会的支持变成个人或组织凭借外国的馈赠和特权演变为寡头的工具,人权变成违法乱纪者、威吓平民百姓者的权利,那么,这些原则就成了瓦解国家的机制,实际上是大谬不然的权利词汇。

今天,埃及和世界各地的国家决策都受大的国际势力的压力。这一点,我们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关贸总协定,在人权大会、国际舆论及其炮制者身上,都可以看到。我们看到的这一切,正在影响世界各国的意志。由于国际势力的增强、各国照顾自己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状况的能力下降,加上宏伟的技术革命造成的物质财富的增加,一般公民在减少他对自己所属国家的依赖;还形成了一种前所未见的独立性,有时也威胁着国家属性,表现为严重的物质生活至上,技术对文明的控制,以及它对社会价值观的影响。

### 第三节 处于当代世界变化中的国家作用

我们必须直面一个痛苦的现实,那就是未来几年将是严酷的,充满令人不快的突发事件和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而且有许多实际的挑战和危险。我

---

诗人、作家,1960年获埃及国家文学奖。代表作有诗集《四十启示录》、《西方的飓风之后》、文集《书中的时时刻刻》、《书与人之间》、长篇小说《萨拉》等。——译者

<sup>1</sup> 即阿巴斯·马哈茂德·阿卡德(1889~1964),埃及著名

们应当首先应对紧迫的内部问题,例如经济危机——虽说它只是世界性现象的一部分,青年危机——它表现为对许多公认的事实和领导缺乏信心,在面全球化过程中身份弱化的危险,厌恶公益工作,拜物主义严重,对未来不抱多大希望,榜样摇晃不定,出现政治真空……我们必须继续竭尽全力追剿腐败,腐败导致对国家失去信心,对真理和法律失去希望,造成了空间寂寞感和自我封闭,归属感变淡,最终形成了一种文明叛逆。

这里就凸显出国家的作用。国家的作用不会消亡,它可能有变化,但不会萎缩。这就要求国家必须与私营部门一起支持市民社会(第三层面)、志愿工作和非政府组织——它们能提供政府无力做得周全的人道主义服务。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说,政府与私营部门没有资助第三层面及提供这类服务,而大量投资兴建监狱以收容罪犯,正是由于缺失了社会公正和被褫夺部门的基本服务,怨声载道、空间寂寞感、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等现象的加剧,罪犯将越来越多。

穆巴拉克总统早就提醒大家注意,在向自由经济转型过程中国家的决定性的和不断变化的作用以及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总统在1998年向人民议会和协商会议发表的演讲中,提请重视国家在调控社会进程、捍卫国家最高利益、维护社会各阶层利益间的应有平衡以实现社会公正方面的重要性,以及国家在物价上涨时保护消费者利益和限制失业方面的作用。在2000年、2001年和2002年向人民议会和协商会议发表的演讲中,他又多次强调了这些观点。

国家的作用以前体现在规划、管理、国营部门、经济活动、提供绝大部分的服务,以及在维护国家结构、民族身份、国家统一、机会均等和分配公正等方面。至于在我们处于自由经济阶段的现在,国家的作用已经不同于它在计划经济阶段时的作用了,它趋向于发挥舵手的作用,规划、监督和跟踪的作用,不陷入到私营部门或市民社会可以承担的执行和实际参与中去。国家的作用只在于关注所谓的公共福利(welfare state),或维持社会公众的满意度和各种利益间的平衡,照顾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他们是最重要的稳定因素和保障投资最有力的环节,促进自由经济和私营部门的发展和生

存能力,同时,还在于鼓励个人的积极性,促进市场活力和保护收入有限者。必须有保障弱势群体最低限度人道主义服务的各种机构、规划和机制,让那些社会重大转折时期的受害者接受培训,使他们能够重返生产岗位,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

国家有责任禁止垄断,保持各种利益间的平衡,不让资本控制政权、收买选票。国家应当明显发挥作用的是,在努力掌控市场经济对社会的影响,防止社会财富和收入方面可能出现的两极分化,以及可能由此引发的社会冲突和不同阶层间的斗争方面。国家应当在两种必需之间实现平衡,一是提供自由经济机会,鼓励私营部门,发挥个人主动性,消除可能产生的个人能力和其实际权利间的巨大差异,以及对机会均等的实际侵犯;二是民主的需求。民主建立在公民权利平等的基础上,表现为每人一张选票,权利和责任方面的平等原则。历史证明,在任何一种制度中,社会各阶层和群体之间的悬殊差距,以及拉近社会各阶层的努力严重缺少,是历史上各个阶段所有帝国和大国崩溃的主要因素;最近两个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聪明人士,凭借他们的远见卓识和对他人的关切,使资本主义避免了许多人曾预料的命运,度过了批评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认为他们无法回避的制度性危机。

国家的作用依然存在,在维护国家结构、巩固国家统一、强化民族身份、深化正统价值观、保护机会均等、反对腐败和不正之风等方面,其重要性还在增强,在应对来自阿拉伯世界和国际范围两方面的挑战方面,国家的作用也在进一步上升。在阿拉伯方面,我们要做到平衡很难,但并非没有可能,那就是在阿拉伯祖国面对各种事件时,必须把握好国家和民族的反应,特别要仔细研究国际社会和美国的反应,考虑对埃及国家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和对我国经济发展和投资能力的影响;应当维护埃及的阿拉伯作用和地区作用——这是民族、历史和道义的必需——与应对以色列和美国的危险之间的艰难平衡。在国际方面,我们应当根据现阶段的国际关系,从单极独霸的国际格局出发,及早利用国际力量平衡的未来变化。因此,必须把埃及国家安全的需要放在首位。毫无疑问,我们正面临着极其严重和复杂的形势,那就是这个超强一极控制着世界,这是一种我们应当现实地与它打交道的局面,

我估计,这种形势将会持续几年。然而,根据国家利益和对局势的良性发展认识,我们必须为后单极阶段做好准备。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得忍受,可以预防的事,我们应赶上。

我们得作出艰苦的努力,通过理性的对话,继续与单极超极大国和发达国家联系。对话只能立足于共同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不能老是着眼于他们利益的未来发展。我们也得化大力气,去结识各种社会的智库人士和思想者,与他们建立起相互理解和对话的桥梁,无论他们所属的社会是傲慢自大,还是顽梗不化。我们面前有一个复杂的任务,那就是构建共同行动轴心,使我们哪怕要经过一段时间,去达成大家一起走向和平的共识。我们还负有神圣的职责,去说服那些被狂妄所辱、受暴力欺凌的人,让他们相信,我们并不仇视任何人,我们的信仰也谴责结冤树敌。生活容得下所有的人,主张暴力和仇恨最终必将自食其果。

我估计,世界上几支崛起的力量,正在蓄势待发。有明显的迹象表明,这些力量将在多极世界中占据地位,在不到10年或15年的时间里,将在世界力量平衡中拥有更大的分量。其中首屈一指的就是中国。她有13亿人,在充满变化、动荡不定的世界里,始终保持着最大程度的团结,连续的领导班子交接都很平稳,发展日新月异,超乎常规。这里,我想起了一次颇有意义的经历。我应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邀请,参加了2001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按照惯例,在这种场合,由长跑运动员接力传送火炬到达体育馆,然后由最后一名运动员手持火炬登上高高的点火台,点燃在北京各处都能看见的巨大的奥林匹克火炬。当最后一名长跑运动员跑到奥林匹克火炬台下时,他没有登上高台,而是从体育馆平地上升起了一艘小型宇宙飞船,升到几公里的高空,接着,船上射出一枚激光制导火箭,点燃了巨大的奥林匹克火炬。我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一刻想到的是,这场表演是对“星球大战”计划的和平而有趣的回应……最近,新闻媒体都争相报道,中国发射了一枚卫星。中国在未来几年可能发挥作用的大小,例证不胜枚举。最近20年里,中国经济年增长率通常都超过10%。根据美国年鉴(ALMANAC)的数据,中国国民

总收入估计为4.5万亿美元<sup>2</sup>,这个数字已迅速接近美国国民总收入。2002年的中美贸易,中国的顺差为936亿美元。<sup>3</sup>此外,还有很大一部分经济活动没有纳入统计或官方的监控。另有5千多万的海外华人生活在世界各地,他们对中国的忠诚始终强烈而牢固,他们是一支巨大的经济力量,拥有超过3万亿美元的财富。种种迹象表明,这条黄龙的势力,也许还有其实体,将不断扩展,进入那些处境相似、利益相近的周边地区。它们与中国母亲语言同一,习俗相通,血缘相混,社会生活和地理环境相似,彼此间还有共同的历史命运相连。中国在许多数学和科学竞赛中取得的优异成绩,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不断反映出的艺术根基,以及当代科学高潮,都说明了这一点。中国的科学高潮,体现在向美国和欧洲派遣大量留学生。上个世纪绝大多数的留学人员没有返回祖国,但世纪末的最后几年,回国科学家和研究人员的比例已经增加。他们带回巨大的知识和经验积累,成为一支庞大的涉及人类进步关键领域的科学家队伍。那奇妙的兼融之处,在于一个共产党国家,能够同时成功地实践完全符合标准的自由经济,从而为这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增添了巨大的活力。在这样的历史敏感时期,中国既不缺乏政治经验,也不缺少周旋能力和必要的灵活性。

第二支正在上升的力量是欧盟。欧盟有德国强壮的肌肉,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大国,有英国精明的理财能力,有法国和意大利为代表的文化、艺术天赋,还有它们巨大的知识积累,尤其是在基础科学领域,以及前苏联国家的航天经验和核技术——我认为,它们正在成为欧盟的战略储备。这将近10亿人口的巨大集体,以其所拥有的国民知识

<sup>2</sup> 这一数据有误。中国国民总收入在2000年首次突破一万亿美元大关,人均854美元,2001年人均890美元。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世界发展指标2003》资料,2002年中国国民总收入为1.2340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6位,人均960美元,位居世界第136位。国民总收入排在世界第1位的是美国(10.2070万亿美元),其后依次为日本(4.3240万亿美元)、德国(1.8760万亿美元)等。——译者

<sup>3</sup> 这一数据并不准确。2002年中美贸易顺差中方统计数据为427亿美元,由于中美各自的统计标准和口径不同,使双方的统计数据往往不一致。——译者

